



从前，我们讨论“啃老族”，也许你会对“啃老”的人表示不屑，但有一群人却在内心里默默地羡慕着他们，他们被人称作“老啃族”。

“老啃族”出身农村，带着全家人的希望，怀揣改变命运的梦想，通过读大学迈进城市的大门。然而，憧憬中的生活刚刚开始就发生转折，养育之恩化为亲情利润，一句“报答”，便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种种局面。

如今的“老啃族”，则更多了一份时代发展的印记：都市白领、公务员、大学生……种种让家乡人艳羡的光环，让他们无法面对现在可能农民工都比自己收入高的现实；工作再难找，也无法放下面子去从事与“身份”不符的职业；日新月异的城市消费方式，让他们分分钟就变身为各种“奴”，房奴、车奴、卡奴、孩奴……但即便再难，他们也是不能或是不愿去诉一声苦的，因为他们是农村父母千辛万苦供出来的大学生。最终他们只能将苦涩一再掩盖，扬起笑容，继续应对“反哺”——反哺父母，反哺兄妹，甚至反哺曾经生活的村庄……所以，与其说他们是“老啃族”，不如说他们更像一群疲惫的“反哺族”，身在追梦路上，却走得步履沉重……

“反哺”无处不在，昔日寒门学子的爱与哀愁——

怎样报答才算感恩啊，我的父老乡亲

反哺族

反哺族，更多的是描述一种生活状态。他们通过寒窗苦读走出了农村，但主要的亲属关系、亲缘环境都还稳稳地坐落在老家；他们生活在城市，却将自己很大部分的经济收入“反哺”给了老家。做城市的人，操故乡的心；人在城市，但无法享受城市的生活。背负着对父母的亏欠、农村“泛家族关系”带来的沉重人情负担，他们犹如陀螺，不停旋转。

光荣在家乡，寂寞在城市

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凌晴

3104元——我下意识地做了个加减法。

正月初七，从岳阳的小山村，回到北京那栋与中南海一街之隔的部委大楼，我的办公桌上摆着今年2月份的工资条——3104元，便是这个月的实发收入。

我叫王朗（化名），今年30岁，是中央某部委一名试用期未满的普通公务员。即便如此，家乡人却早已认定，我是个祖坟冒青烟的“通天”人物。如此高的评价，让我在面对父亲想要建房的希望时，只能选择倾尽所有——尽管我因此而在物质的压力下动弹不得，行在宽阔的北京大街，生活却显得格外狭隘。

水涨船高的建房愿望

大年初六，家里喜气洋洋。在刚刚建成的新楼房里，我年近六旬的老父亲风风光光地迎娶了我的后妈。

去年，这栋让父亲喜笑颜开的新房还只是一栋破旧的泥砖房。曾经，做小包工头的父亲赚了一些钱，家境在当地还算可以。可是，父亲好赌，甚至将姑奶奶辛苦攒给我的学费全部扔上赌桌；他打骂母亲，最终换来夫妻离异的结局。然而，父亲又是不幸的，一场交通事故导致他左肩肩骨与锁骨开裂，失去了干重活的能力，也让他风

光成了过往。

在我在外求学的那些年，家里的泥砖房渐渐破败，而左邻右舍间如雨后春笋般林立起来的新房，让父亲有些坐立不安。我想，他心里是憋着一口气的。

所以，当父亲提出要新建楼房、希望我能分摊几万元钱时，我二话不说，拿出了自己从2009年参加工作以来积攒的大半积蓄——父亲数着钱，露出了一种终于熬出头的表情。而作为儿子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觉得这是一份应尽的孝道。

不料，随着工程推进，父亲东

家看看，西家瞧瞧，“取经”之后，眼光就高了起来。他时不时给我吹风：“隔壁王爹家的窗户用的铝合金，配钢化玻璃，比木制的窗户好很多。”宋姨家里的电视机是买的液晶平板的，钱都是他家小儿子出的。那个后生仔在广东打了几年工而已，一副赚了很多钱的样子，其实哪里有我儿子本事大！”……

就这样，原本10万元的建房预算，一下子水涨船高飙升到了20多万元。面对父亲这样那样的明示或暗示，我只得倾尽所有，先后掏出12万元，全部投入到建新房才算完事。

父亲的骄傲背后的无奈

给父亲建房的钱超过预期，这也让我在北京的生活全面告急。

2014年1月21日，春节前一周，因为一再拖欠5000元房租，房东向我下了最后通牒：不给钱就搬！

当时的我苦笑者摇头——一分压垮英雄汉，家乡的父亲大概怎么都想象不到，他引以为傲的儿子正在遭受这样的尴尬。

端着国家公务员这个看似旱涝保收且风光无限的“铁饭碗”，别人羡慕，但也只有“城内人”，尤其是年轻的公务员，才能真真切切体会到其中的不易。

“帮个小忙”，其实尴尬

而替后妈的女儿找工作，则是年前父亲强行给我下达的任务。

我立马联系我这个“新妹妹”，要她拿一份详细的简历给我。我想着，接下来或许能找熟识的朋友或同学试一试，替她搭桥。

拖了二十几天，我才收到她的简历。她今年23岁，职高毕业。对新工作的要求，不多，只有两点——挣得多，干得少。

收到简历的第二天，父亲的电话就追来了，问我找好没。

我无言以对。

回顾今年的春节长假，总是有完全陌生却无比热情的面孔凑到我的面前，而寒暄的话题，无外乎是儿子要进学校，侄子要找工作等等。他们觉得，国家部委——多么不得了的地方，那解决他们的这些“小要求”，也应该只是一包烟、一杯酒那么轻松的事。我只能苦笑，却怎么都说不出一个“难”字——其实潜意识里，我也不愿意丧失那一份让人愉悦的骄傲感。所以，

种说不出的委屈。光鲜亮丽的北京，我却始终无福享受。偶尔我会羡慕那些父母有退休金、有存款的年轻人，他们有的是“啃老族”，刚刚毕业一两年就在父母支持下买房买车，有的即便不“啃老”，也能够放心地花自己的薪水，旅游、购物、娱乐随心所欲。而我，做着城里人，操着农村的心，动辄就是“不孝”，想抠门而不得，有难更是不能诉。

而此时，家乡的新房已经建好，不仅舒适，还相当体面，洗衣机、电冰箱等家电都是“高配”的。父亲说，他很高兴。

最终我也只是打着哈哈能推就推。

最让我吃惊的是，父亲竟然瞒着我，一口应承下替远房表叔找工作的事，还收了人家一个3000元的红包！后来，我找到父亲晓之以理，他才将红包退回。但我仍然在后怕——顶着家庭最大希望的光环走出去，要承担额外的经济压力是一回事，但如何面对家乡人复杂的亲情追索、如何面对他们轻飘飘说出的一句“帮个小忙”，似乎我要学习和承受的都还很多。

吃上“国家粮”后，亲戚从此成“债主”

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李旦

2013年年底，一大家子人围在我父亲床前，不停地抹眼泪。我站在最里面，气若游丝的父亲盯着我，艰难地说：“我和你妈有4万元存款，但这钱得给你妈养老和孙子读书用，所以我的安葬费由你来出。”

交代完后事，父亲走了。还没来得及宣泄心中的悲伤，“钱”的问题便不合时宜却迅速地被提了出来——在父亲咽气的这间房里，我和弟弟妹妹的争吵开始了。

“为什么又要我来出？安葬父母本来就是儿子的事情！”

“你是吃‘皇粮’的，你不出谁出！爸爸死前都交代清楚了，你要不出就是不孝！”……

激烈的争执，让我的眼睛里不再有泪水，转而生出了愤怒。

我叫孙群娥，双峰县甘棠镇人。虽然我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，但其实这种遇事就理所当然由我来拿钱的情况，我实在遇到太多了。

25年，始终为他人奔忙

我是家里的老大，再加上成绩一直不错，父母砸锅卖铁就把我一个人供上了大学。毕业后，正好父亲退休，我便顶了父亲在汽车站的职，吃上了“国家粮”。

也许有人要说我幸运，因为我是兄妹几个里唯一一个走出黄土地的人；再说得重点，我捧起的这个“铁饭碗”，背后都是我家人的付出——尽管很多时候，我宁愿不要这份幸运。

自从我上班开始，接济家里便成了我不可推却的“天职”。可是，我那点微薄的薪水很快便跟不上家里人水涨船高的需求。

2006年，家里建新房，我出了15000元；2008年弟弟娶媳妇，在我这借走一万，只还了5000元；2010年，妹妹的孩子在双峰县城读书，一直在我家吃

住，没给过一分钱生活费；2011年，父亲患了肝癌，在医院治疗花了4万多元，我出了一半。朋友间人情往来送的烟酒，父母看到就立刻惦记上：“你家里的烟酒要是多得没地方放了，就带一些回来给你弟弟。”但人家送的礼其实都是欠的人情债，到最后，我还得自掏腰包去还人情……这样的小账算不完，而更多的时候，明明不应该由我独自承担的，也成了我的分内事——

而更多的时候，明明不应该由我独自承担的，也成了我的分内事——比如父亲的安葬费。而这一切的理由，就仅仅因为我吃“国家粮”。

我如同家人的自助银行，没钱就找我要已经成了一种习惯。弟弟妹妹问我要钱都是理直气壮，好像这是我欠他们的；而且他们认为我的工作就是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纸，钱来得轻松简单，而他们挣的辛苦钱花一分出去都得肉疼。如果我不同意给，我妈就会站出来来说情：“现

在就你条件好点，你应该帮他们一把。再说，家里只把你一个孩子送出去了，你爸的工作也是由你接班的，弟

妹心里肯定有想法。你大度一点，就当这钱是给我和你爸了。”从20岁参加工作到如今45岁，我一直在不停地给家里钱，而

且数目越来越大。到后来，连没什么来往的堂叔也来跟我借钱。如果我不借给他，他便有充分的理由一直记恨——农村自有一套令人

头大的人情逻辑，而且几乎让人没有说不的机会。

（下转 A05 版）

